

編後語

香港對於整個中國的價值，難以用語言和文字窮盡。但是，時光荏苒，東方之珠的光芒彷彿有黯淡之勢。曾幾何時，香港經濟光照神州，但到了今天，人們所關注的已經不再僅僅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也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模式，而是涉及到社會治理和政治發展的更深層的制度性問題。因此，關注香港的政治，尤其是關注香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僅對於我們了解香港本身，而且對於我們思考中國未來的變遷，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三篇文章，分別從三個極為不同的視角，來透視香港的政治發展。馬嶽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反思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及其未來的走向。任何政治制度能否正常運轉，均同其所嵌入的社會具有何種政治文化，也就是主流政治價值觀為何，具有密切的關聯。香港政治體制的設計適應於殖民與後殖民時代「難民社會」的「功利家庭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對政治低干預主義的期待，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香港社會經濟的轉型帶來了政治文化的變遷，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參與意識的勃興對香港的政治發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香港社會經濟生活變遷的一個具體體現就是公民社會的興起，尤其是在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公民社會」這一概念在香港從學術界進入了公共域。陳健民系統梳理了公民社會在香港的發展歷史及其對未來社會生活與政治發展的影響。實際上，在一個風行政治低干預主義的地方，公民社會的底蘊本身就十分深厚，因此香港有望在華人社會中發育出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自主模式。然而，公民社會發展的意涵並不限於社會自主的勃勃生機，更在於社會對於治理的廣泛參與，即公民社會組織以制度化的方式參與到公共政策的決策、實施和評估的過程之中。公共部門與公民社會的合作夥伴關係，是善治 (good governance) 的核心和基礎。

當然，香港能否在未來孕育出令人期待的政治發展和善治模式，並非樂觀。其中，最令人擔憂的是「香港大陸化」。嚴飛對這一問題的梳理，有助於我們在更廣闊的視域來思考香港的問題。某些內地人士以所謂香港民主化「並不是民主與否的問題，而是國家利益的問題」為由，來質疑香港社會對政改的籲求。對此質疑，不妨反過來加以思考。香港的民主化的確關涉中國的國家利益，關涉到內地的民主化進程。只有大陸民主化，才能避免「香港大陸化」。因此，在香港民主化的進程中，強調本土性固然重要，但是一旦將本土性過度解釋到試圖將香港與內地切割開來，不僅自限視域，而且會適得其反。

誰都知道，中國大陸正在發生鉅變。當然，這一鉅變的內容還有很多令人困惑之處，未來的走向也充滿了各種變數。對此，學術界的深入研究就顯得極為迫切。本期刊載的郁建興之文，對有關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和治理的學術研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實乃及時之作。